

观念变革是农业巨变的关键

Idea Changes Are the Key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李仕明 曾 勇

(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成都 610054)

我国国民经济“九五”发展计划和 2010 年远景规划明确提出:到 2000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在 1980 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届时,在中国大陆基本消灭贫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这是一个令人鼓舞而又异常艰巨的目标,而农业是达此目标的关键。

农业是关键,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认识和处理农业发展问题和农村发展问题、农民利益问题,以实现农业的巨变。而整个问题关键中的关键则是应当变革我们的传统观念,树立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指导思想。

1. 不容长期牺牲农业,必须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战略产业,这本属不争之议。但是,实践中这种思想并没有真正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战略指导,从而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诸多的制约。如果我们的决策者和决策机构不能从根本上变革对农业问题的传统认识,这种制约亦难以消除或软化。目前,尤其应当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研究、分析我国农业发展,把它作为一个战略系统来认识。

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固然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演替,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但是,这种农业比重的下降绝不意味着农业的衰落。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定。

但是,基于对夺取政权时期以“小米加步枪”对付“飞机加大炮”的痛切感受,自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我国长期滋生和存在一种超强的“工业化情结”。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需要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因此,农业成为我国可供选择的资金产出的“金牛”:一方面,加大对农业的索取,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将相当份额的农业利益向工业转移(即由价格漏斗到利益漏斗,这一点将在稍后加以讨论);另一方面,减少对农业的投入,将对农业的投入转

移到工业的发展上——我们正是这样迈向“工业化”的。据统计,1952~1992 年,我国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35.5%,但同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5.9%,且逐期下降:“五·五”为 10.5%，“六·五”为 5.1%，“七·五”为 3.36%,1990 年仅 3%,1994 年则进一步降至不足 2%,而合理的比值的下限应当为 7~8%。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农业机械与排灌基本设备的缺乏,农业自然灾害频繁,自我保障能力差。

投入上的重工轻农直接导致了工农业发展速度的严重失衡。据统计,1986~1992 年,我国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为 3.2 : 1,其中:1991 年 3.9 : 1,1992 年 4.2 : 1,而 1993 年更上升为 5.33 : 1,1994 年则高达 5.5 : 1。

我国研究经济波动的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波动较为明显的国家,我国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于农业,或者说,工农业发展速度的严重失衡是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的最基本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昭示我们:农业的低速发展不能支撑工业的高速增长。理想的工农业发展速度的比值应当在 1.5~2.5 : 1 的区间。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我们就必须变革指导思想上长期的重工轻农,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切不可狭隘地视市场经济仅是强化流通、交换、商业、市场。实际上,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意味着要切实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应当也不允许长期牺牲农业,工农业的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标志。

2. 问题的焦点、核心是,必须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人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后遗症就是东西部差距急剧拉大、两极化趋势明显。但是,人们往往还忽视了另一个也许是更为严峻的现实:我们矢志要消除的三大

差别,尤其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反而急剧地加大了。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实质是农民问题,核心则是农民利益。据统计,在我国,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的比值约为3:1。有关文献表明,农民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幅度,1978年~1984年为15.1%,1985~1988年为5%,1989~1994年为2.7%,呈现持续下降。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不仅在绝对数额上远高于农民,而且在增长幅度上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日益拉大,城乡生活水平极为悬殊。

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着农村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旱、涝、虫、病等灾害严重等多重原因,但它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在观念和政策上存在着某种甚至严重的对农民利益的漠视,城乡严重不公。例如,农民不仅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和职工所享受的各种公房、公费医疗、粮油补贴等福利,而且还要承担众多的城市居民从不承担的文化、卫生、防疫、治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收费、摊派等。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已日益突出。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5亿人,且每年还将新增1300万劳动力,目前已向乡镇企业转移1.2亿人。但是,从总体上讲,除去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区域,乡镇企业难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上,由于乡镇企业发展的相对缓慢和技术水平的相对提高,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已在减弱(例如,1984~1988年,乡镇企业每年平均吸收1260万农村劳动力,1989~1992年,每年仅平均吸收260万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新的转移渠道。然而,我国目前的城乡二重户籍制度,在城市实行的是一种就业、补贴、社会保障合为一体的劳动力管理制度,使城市人口几乎垄断了城市非农产业的就业门路。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了社会公平这一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原则。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城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居民生活提供巨大贡献之后,仍然不能获得城市的承认和接纳,只能被称为“民工”,甚至被视为“盲流”,被处处防范甚至歧视。

正是对农民利益的某种漠视导致了农民收入低下、增长缓慢甚至增产不增收。这种状况势必严重挫伤农民的务农积极性。近年来,农民大量减少对农业、生产、土地的投入,日益严重的撂荒、粗放种植,以及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应当被视作农民“厌农”的严峻信号。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承认和保护农民利益,必将长期制约我国农业的发展,而且可能危及社会安定和国家的基础。只有重视、承认和保护农民利益,才能有效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

业大国,没有农民的普遍富裕,就很难实现全社会的“小康”。“八五”初,我国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口达8500万人,经过几年的努力,仍剩6500万人,显然,消除绝对贫困无疑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但是别忘了,我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并且差距在日益扩大,这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严峻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脱贫工程”已经由简单的“温饱工程”向文化脱贫、智力脱贫、科技脱贫等综合工程发展。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建立在重视、保护农民利益的坚实基础上,就很难取得巩固性的成果。如果说市长抓“菜篮子”、省长抓“米袋子”卓有成效的话,那么,就应当有更高层次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来直接抓农民利益,抓农民的“钱袋子”。

3. 如实反映,切实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

在我国许多人眼里,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似乎是农业的本来属性。但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偏见。如果说比较利益差真是农业的固有特征,就很难说明已经高度工业化的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为何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粮食出口大国。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不高这一现实(或者准确地说应当是农民、农村、农业地区从农业生产中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低),实在是我国长期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

实际上农业的比较利益并不低。不用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农不稳;也不用说农业提供了人类生存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无粮则乱。仅就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言,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原料和市场。计算表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关联度分别为0.79、0.67和0.4。

缘何又有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之感呢?原因在于由于“价格漏斗”而形成了“利益漏斗”。据有关文献统计,由于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农业每年为国家财政的“隐性”贡献达1000~1500亿元,从而造成了我国农村、农业、农民严重“失血”,甚至损害了其造血功能。实际上,到1995年,我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不足2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国际市场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已达1500美元。我国早已进入国际通行的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在我国,这种反哺机制不仅未能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反而有加大的趋势。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失误,使得我国的农业比较利益被人为扭曲而畸型。据统计,在我国已确定的国家级500个商品粮基地县和150个商品棉基地县中,竟无一进入全国经济实力500强县的行列,“粮棉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成为普遍的现象。这种严峻的现实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各方对农业发展的麻木:天天讲农业要摆在首位却

(下转第15页)

比回渗的要多一些,以便把组织液中的细胞代谢产物带入孙络间隙维中的毛细淋巴管,最后汇入胸导管和右淋巴导管经静脉再进血液循环。针灸是在间隙维的组织液中加大物理扰动并随而引发各种离子的电振荡,这将显著地提高细胞间液水静压,从而持续得到有效滤过压为负值的时间。这不仅使孙络间隙维中过量滞留的组织液(所以才浮肿)有了回渗到毛细血管的压力,更有了渗入毛细淋巴管的压力。实践证明,我们隔日针刺一次,辩证归经取穴3~5个(辩证归经,我们理解为顺应自组织分工区域),不仅消肿效果明显,而且整体排水能力(尿次增多,由常年溏便——大肠吸收水份能力低下——变为正常干便,由无汗到少汗)明显改善,腹胃涨满感明显好转,消化功能也好转。

在经历了上述多层次的研究、思索和亲身体会之后,是不是可以这样认定:认识经络,利用经络,这是人类对自身消除干扰、减少外侵、活得更为健康的必由之路;甚而,是“人体”这种高度自动化的“生命电脑”系统实现“自我检修”的必由之路,是人类今后减少化学药物负面干扰,又能提高生命服务质量的可行之路。我们认为,我国终将通过对经络本质的认识和作用机制的科学阐述及实践验证,对世界文明,对人类生理、病理、保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附记:本文除文中已标记的参考文献,还

十分认真地读了《科技导报》1994年第9期郑文岭、马文丽的《经络的产生和功能机制》及1995年第6期张人骥的《经络——重要的生命科学命题》和胡云章的《经络的本质——蛋白质压电传感效应假说》等三篇文章。如果以上诸文犹如一组讨论,本文就是我们二人参与讨论的一次发言。)

参考文献

- [1]贺志光主编:《中医学》,P43,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1994
- [2]高歌:“对非线性科学的理解、体验与思考”,《科技导报》,1991.3,P3~5
- [3]蔺云桂:《经络图解》,P182,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 [4]刘士俊:“经络之谜已经揭开”,P34~35,《亚洲医药》(香港)总第4期,1994
- [5][美]商成、楼宇伟、万三:“生物电振荡——一项可能对探索中医机理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科技导报》,1991.3,P37~40
- [6]永田亲义:《量子生物学入门》,P163~174,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
- [7]杨学鹏:《阴阳——气与变量》,P84,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 [8]刘安西、陈守同编译:《细胞膜离子通道》,P392,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47页)

始终摆不到首位,常常喊增加农业投入却始终只有雷声。农民和基层的务农积极性大幅下降,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组织者的地方政府倒不着急,中央“地区以下各级政府应该用主要精力抓农业”的指令往往成了听而不闻的“耳边风”。人们称农业在领导决策时的地位是“风调雨顺忘农业,肚子饿了想农业,实际工作挤农业,口头喊农业,投资少农业”。农业成为“领导口头讲讲,基层口号喊喊,农民口粮种种”的“三口”产业。1990年至1994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5年在4500亿公斤的产量附近徘徊足以被视作我国经济发展的某种预警信号。

建国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同样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是以农业、农民、农村利益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来换取这种成就的。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允许,也不可能再以这种代价为基础。因此,我们应当彻底变革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承认和维护“三农”利益,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保护农民利益,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也只有提高了农业的比较利益,使农民和地方政府从农业中获得优厚的“回报”,才能真正调动各方对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主动

性,从而形成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使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由于多年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失误,我国农业失血严重,造血功能不足,提高农业比较利益,目前尤应建立和强化对农业的“反哺”机制。就资金“输血”、培育农业造血功能而言,这种“反哺”应包括:中央政府的农业“反哺”基金;以省、区为单位的农产品净(或主要)输入区(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对农产品净(或主要)输出区的对口“反哺”基金;以省区为单位建立区域内的农业“反哺”基金及相应的“反哺”网络。

我国农业的发展绝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它的长期稳定发展,固然还需要推动完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需要实现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外延型到集约型、效益型的根本转变,需要发展模式的产业化转换,需要强化科技、资金、物资、政策的投入,等等。但是,这些变化,都只是也只能是观念和指导思想变革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能在经济建设的观念和指导思想上先有一个根本的变革,一切措施都只会停留在一种权宜性状态,难以真正奏效。

(责任编辑 王宏章)